



烽火中的红色报刊

《晋察冀画报》

光影里的战地风云

■ 王志朋 蒲元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到访解放区的国际友人和大后方人士,目睹八路军、新四军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无不惊叹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而当他们看到物资匮乏、战火纷飞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的第一本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时,更感震撼,称这是“奇迹中的奇迹”。

1942年5月,晋察冀画报社宣布成立,军区政治部任命沙飞为主任、罗光达为副主任、赵烈为政治指导员。画报社下设编辑、出版、印刷、总务4股,全社共计100余人。当时,晋察冀画报社相比其他敌后根据地刊物新闻出版部门,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画报出版需大量照片作为基础,而晋察冀根据地有一支训练有素且稳定的摄影队伍。早在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就成立了新闻摄影科,所属各分区的摄影科(组)随后也陆续建立。铜版印刷技术是出版摄影画报的关键,它能再现照片黑白之间的丰富连续色调。晋察冀根据地成功邀请到曾在北平负责照相制版的技术师,并设法筹措到照相制版机和印刷机。1941年4月,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块铜版在晋察冀试制成功,为《晋察冀画报》的创刊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此外,摄影和办画报耗费巨大,晋察冀根据地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解放区摄影大事记》多次记载,《晋察冀》军区调拨数十两黄金赴平,津采购”等事件,这在当时非常不容易。

1942年7月7日,正值全民族抗战爆发5周年之际,《晋察冀画报》在河北平山县碾盘沟村正式创刊。

战时刊物,言战为战。聂荣臻在《晋察冀画报》的创刊号中写道:“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的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的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在如何的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自创刊起,《晋察冀画报》始终坚持晋察冀军区为其明确的办刊目的:一是鼓舞斗志,建立信心,争取支持,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二是给人民、历史留下真实记录。

晋察冀军区部队的对敌作战行动,是《晋察冀画报》聚焦的重点领域。包括北岳区秋季反“扫荡”战役、攻克任丘、林堡伏击战、夜袭新安城、攻入定襄城、冀中平原战斗、清风店歼灭战及解放石家庄等战役战斗,在《晋察冀画报》中均有报道。对于创刊前发生的黄土岭大捷、百团大战等选择地进行了重点回顾。以1947年12月出版的第13期为例,该期作为解放战争特辑,专题报道了清风店歼灭战和解放石家庄战役,刊载摄影作品近百幅。其中不少作品取自战斗前线,真实感人,内容与形式俱佳。

晋察冀军区部队的训练、行军乃至日常生活,也是《晋察冀画报》重要的报道内容之一。例如,1943年5月出版的第3期《晋察冀画报》,就刊登了雷烽的“冀东军区子弟兵”系列新闻摄影作品。这些作品真实记录了八路军在古长城内外战斗与生活的场景,包括“驰骋江河、挺进热南”“冀东平原战果之一部”“塞外的烽烟”“摧毁人圈”等4个版块;长城阵地警惕的士兵、峻岭中穿行的队伍、辽河岸边学习的人群、攻克日伪据点后欢快的人群、刺杀训练中动作整齐的将士……八路军官兵昂扬的精神、良好的风貌,无不跃然纸上。

除大量发表与根据地军事斗争直接相关的摄影及文字、漫画、木刻作品外,《晋察冀画报》的视野也投向更广阔的领域:党和军队领导人活动、英雄人物与群体事迹,民主政权的建立、巩固与发展,边区生产、卫生、文教等工作,血肉相连的军民关系……

《晋察冀画报》用最直观的方法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正在华北大地上展现出有成效的革命工作。抗日战争时期,这本画报不仅在根据地广泛发行,拥有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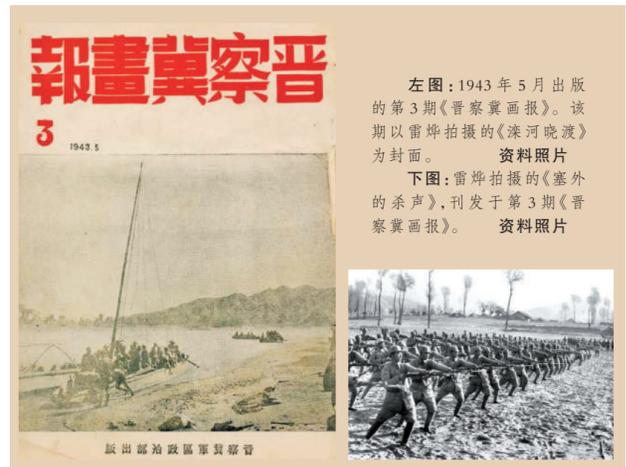
高的传阅率和影响力,还传播到了包括沦陷区在内的广大地区。

从1942年7月到1947年底,《晋察冀画报》发行13期,共计3.2万册。1948年5月,晋察冀画报社同隶属于晋冀鲁豫军区的人民画报社合并为华北画报社。《晋察冀画报》由此圆满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通过富有战斗性的图片、翔实的通讯报道,宣传了敌后抗日活动的辉煌业绩,有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影响,弘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激励了广大军民的士气,为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时光似白驹过隙,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诞生于烽火中的《晋察冀画报》仍以特殊的方式拨动着人们的心弦。

今年1月14日《解放军报》“长征副刊”整版刊发《寻找·永生》一文,讲述了记者找寻一位照片里的战斗英雄的故事。2025年九三阅兵中,第79集团军某旅“红五连”战士赵捷携带着该连首任连长李永生留下的照片,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照片中,一位八路军肩扛“三八大盖”、手提轻机枪,目光如炬,气势豪迈。事实上,这张照片早已在网络上传播广泛,但由于缺乏相关背景说明,主人公的身份曾引发激烈争论。令人意想不到的,最终确认身份的关键信息,竟是在80余年前出版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中。在该期“胜利品”一页,这张由杨国治拍摄的八路军英雄照赫然在列,且配有文字说明:“百团大战时,我边区八路军二团一连连长李永生同志在深源三甲村战斗中,一人缴获敌之轻机枪一挺,三八式步枪三支。”后来,记者辗转找到了李永生的孙子——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由于祖父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老人从未见过他的模样。当记者将这张刊登在《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上的李永生高清图片递到老人手中时,他凝视着相框里从未谋面的祖父,瞬间泪流满面,对着照片低声倾诉着积攒几十年的思念。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晋察冀画报》正是这样的经典。直至今日,由于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及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元素,这本珍贵的刊物依然吸引着无数人去挖掘、探索和研究。在其办刊过程中,我军老一辈新闻工作者为胜利克服万难,甚至不惜献出生命的精神力量,也持续激励着新时代的中国军人,向着伟大复兴的征程阔步迈进。



左图:1943年5月出版的第3期《晋察冀画报》。该期以雷烽拍摄的《滦河晚渡》为封面。

资料照片
右图:雷烽拍摄的《塞外的杀声》,刊发于第3期《晋察冀画报》。

资料照片

元宵佳节鏖战急

■ 胡遵远 漆仲健 王之龙



位于江苏省溧阳市竹箦镇水西村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司令部旧址。资料照片

万众欢鼓舞、踊跃支持,敌人则闻风丧胆、溃不成军。

新四军粉碎日伪军偷袭江南指挥部阴谋

1939年11月7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苏南溧阳水西村成立,陈毅和粟裕分别担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

1940年2月22日元宵节,密谋已久的日伪军800余人从溧水偷袭溧阳水西村西面仅1公里的安中里,目标直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听到枪声,驻安中里的新四军教导队和“江抗”2团一部迅速迎敌,投入战斗。

水西保卫战是新四军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也是江南抗战史上的重要一役。此次战斗给茅山根据地群众留下深刻印象,在江南抗战史上写下了辉煌篇章。

西北野战军歼灭胡宗南部整编第29军

1948年2月12日,依据“围城打援”的宜川战役计划,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第1、3、4、6纵队,分别从绥德、米脂、清涧、安塞地区向南开进;同时命令第2纵队从晋南曲沃地区出发,经禹门口西渡黄河参战。为摸清敌情,彭德怀派出20余名侦察人员潜入黄龙地区侦察。16日,部队进至金沙镇、甘谷驿、延长地区隐蔽集结,进行战役准备。17日,西北野战军在延长以南的佛古原再次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研究战役部署和作战计划。会议最终决定,以第3、6纵队各一部围攻宜川,集中第1、2、4(欠骑兵第6师)纵队和第3、6纵队各一部合力打援。

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三),第3、6纵队向宜川攻击前进,肃清城周反动地方武装,扫除外围据点后,于24日将宜川城包围并发起攻击。至27日,部队突破国民党守军外围防御阵地,先后占领老虎山、万灵山、外七郎山等要点,将敌压缩于城内。

此时,第1、4纵队进至瓦子街以北指定地域集结,待机打援。第2纵队于23日由禹门口强渡黄河,向宜川西南圪

台街地区开进。

胡宗南得知宜川被围后,除令宜川守军坚守待援外,急令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部经瓦子街轻装驰援。2月26日,刘戡率整编第27、90师共4个旅的兵力,由黄陵、洛川地区出发,沿洛宜公路驰援,于27日进至瓦子街地区。

瓦子街是洛宜公路的咽喉要道,经过此地的公路两侧是两道东西走向的山脉,两山之间形成一条长约15公里的峡谷。该峡谷沟深峡狭,荆棘丛生,为我军隐蔽集结和伏击援敌提供了有利条件。

2月28日,刘戡率部继续东进,企图在当日赶到宜川。10时许,当敌军先头部队进入任家湾、丁家湾地区后,西北野战军迅速调整部署:第3、6纵队各一部兵力正面抗击援敌,阻止其与宜川守军会合;第1纵队待敌全部通过瓦子街进入伏击圈后,立即切断敌军后路;第2纵队由东南向西北进攻敌军右翼;第4纵队由北向南进攻敌军左翼,由此形成四面合围之势,以歼灭援敌。

为确保援敌后续部队全部通过瓦子街并进入预设伏击圈,我军采取且战且退的战术,成功诱敌进入距宜川西南10余公里的铁龙湾地区。2月29日凌晨,第1纵队在瓦子街以西向敌军后卫发起攻击,至6时攻占瓦子街,截断敌军回撤之路。刘戡发觉陷入我军包围后,企图集结兵力从瓦子街东南山高地突围。

若不迅速堵住这一缺口,将给敌人留下突围逃窜的通道。于是,敌我双方围绕这一高地展开殊死争夺。激战终日,第1纵队击退援敌30余次猛烈反扑,控制了瓦子街东南山高地,封住了敌军南逃的唯一缺口,为全歼援敌创造条件。此时,整编第29军已全部进入西北野战军设置的“口袋”之中。当夜,我军各纵队控制了敌军周围全部高地,将敌军压缩于乔儿沟、丁家湾、任家湾之间的狭小地区,形成铁桶般合围的态势。

3月1日9时许,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下达总攻命令。各纵队沿洛宜公路及其两侧高地,从多个方向发起全面攻击。至16时,公路两侧的敌军阵地全部被攻占。残敌龟缩于沟壑之中,狼奔豕突,纷纷投降。尽管胡宗南多次派飞机至瓦子街助战,仍无法挽救刘戡全军覆灭的命运。17时许,被围敌军全部被歼灭。

在瓦子街地区围歼援敌的同时,西北野战军围攻宜川的部队,继27日夺取城外据点后,连续发起攻击。至3日8时,我军全歼守军整编第24旅5000余人。至此,宜川战役胜利结束。

宜川战役是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后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此役全歼胡宗南集团主力整编第29军军部、整编第27、90师及整编第76师24旅,共2.9万余人,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一战役的胜利粉碎了胡宗南企图阻止西北野战军南进的企图,改变了西北形势,打开了我军南进之门户,为继续发展外线进攻作准备,消灭胡宗南集团有生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



镶嵌在肖家老宅屋柱内的3个铜板。资料照片

挑水。一名战士在挑水回来进门时,不小心碰倒门口一个空坛子。赵老汉说没关系,战士却执意要赔偿,将身上仅有的2个铜板递给赵老汉。红军离开后,赵老汉始终没有动用那2个铜板。

二郎坝的2个铜板,是红军纪律的生动缩影。一年之后,川西的那个“青稞与白洋”的故事,则将这份纪律坚守延伸至民族地区,书写了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

1936年,红2军团渡过金沙江,翻越扎纳亚山口,来到四川得荣县。此时,红2军团的一支后卫部队已断粮几日,饥饿把战士们带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得荣县城只有几座荒废的房子,战士们找遍县城,一粒粮食都没找到。就在大家失望之时,一名战士在一处民房的牛圈中偶然发现了埋藏的一大缸青稞。红军纪律严明,绝不随意占用群众物资。连队党支部决定为此专门召开支委会,共同

在革命战争年代,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我军在党的领导下,以无往不胜的英雄气概、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夺取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即使在元宵节期间,他们依然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凯歌。

红军陕甘游击队奇袭照金民团

照金位于陕西耀县西北部,与淳化、旬邑等县接壤,地处桥山山脉南端。这里山林密布、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是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理想区域。20世纪30年代前期,照金地区的土地高度集中,绝大多数土地被地主豪绅占有。一些大的地主家都有护院武装(民团),这些民团既是国民党的地方反动武装,也是地主豪绅欺压百姓的工具。照金人民在苛捐杂税、高额租债和民团兵匪的压迫下苦不堪言。加之连年灾荒,周边省区饥民大量涌入,进一步加剧当地的贫困。大批贫苦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灾民与当地农民联合开展抢粮、分粮斗争,群众的反抗斗争日趋高涨。

在此背景下,中共陕西省委根据斗争形势需要,逐步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心转移至照金地区。1932年2月12日,根据陕西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2月20日夜,谢子长等率领红军陕甘游击队突袭照金。时逢元宵节,照金街头锣鼓打鼓、耍社火,热闹不断。民团丁们打着灯笼中放松戒备,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喝酒吃肉,整个街道沉浸在喧闹之中。

突然,随着两声清脆的枪响,红军陕甘游击队冲入照金街道,迅速合围民团并缴获其枪支。街上看社火的群众起初惊慌失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混乱中,有人高声呼喊,向大家说明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专为穷人办事。听到红军到来的消息,原本骚动的人群逐渐安静下来。红军官兵抓住时机,向百姓宣讲革命形势,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打土豪、分田地。

这次奇袭狠狠打击了照金民团的嚣张气焰,给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照金人民带来希望,点燃了照金革命的烽火。同年12月,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最早建立的正规武装。尽管成立初期武器极度匮乏,几个人才能分到一杆枪,连土枪都十分稀罕,大刀长矛乃至农具都成了红军战士手中的武器,但红26军第2团官兵凭借坚定信念和英勇顽强,在首战焦家坪、火烧香山寺、鏖战庙湾镇等一次次战斗中接连取得胜利。他们转战照金各地,所到之处,当地民

细微之处见证红军铁纪

■ 贾昊 莫葵健

在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石厢子彝族的肖家老宅中,3个铜板从上至下呈一字形嵌入一根屋柱内。这是红军长征时期毛泽东同志留给房东肖有恩的食宿费用。90年过去,屋柱早已斑驳,爬满岁月的痕迹,而3个铜板露出的部分依然闪闪发亮,成为红军严守群众纪律、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珍贵见证。

1935年2月3日,正值农历除夕,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的中央红军抵达了素有“鸡鸣三省”之称的石厢子。

部队到达后,战士们严格遵守纪律,无人擅自进入民宅或惊扰百姓。加之先头部队的宣传工作成效显著,当地群众发现这支队伍与其他军队截然不同,纷纷主动打开家门,邀请红军进屋休息。当天下午,随着红军大部队陆续抵达,石厢子沿街的屋檐下、过道、院坝和堂屋都住满了红军战士。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几位领导人也住进村民肖有恩的家中。

次日正值正月初一,红军召开群众大会,将打土豪没收的粮食和衣物分给当地群众,还宰杀劣绅家的肥猪与大家聚餐,共度新春。在石厢子短暂驻留期间,中央政治局召开了“鸡鸣三省”会议。

2月5日上午,中央红军根据会议决定,即将离开石厢子,向云南扎西进发。临行前,借住在村民肖有恩家中的毛泽东,将3个铜板塞给肖有恩,以感谢他连日来提供的食宿便利。肖有恩深受感动,为防止铜板被土匪或劣绅抢走,便将铜板藏进了屋柱的缝隙里。新中国成立后,家家户户张贴毛泽东画像,肖有恩这才认出当年送他铜板的首长竟然是毛泽东。“3个铜板”的故事就此在当地传开。

3个铜板,轻若鸿毛,却承载着长征路上最质朴的军民深情。在革命岁月的烽火硝烟中,这般的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远不止这一桩。

1935年2月,红军在贵州二渡赤水转移时途经二郎坝。一天,村民赵老汉忽然听见叩门声,循声过去打开门,原来是途经此处的红军战士,他们想向赵老汉借一口锅烧水。赵老汉拿出屋里的吊锅,又让家人帮着战士烧火。此时天色已晚,寒气逼人,赵老汉便邀请战士们进屋休息,但战士们以部队有纪律为由婉拒了这份好意。

第二天一早,红军战士归还吊锅时,发现赵老汉家的水缸空了,便决定帮忙